

山西道教历史发展特点析论

贾发义

提 要：道教在山西的传播，经过北魏寇谦之改革道教之后得到迅猛的发展。隋唐王朝对山西道教大力扶持，使山西道教渐呈兴盛之势。宋元明清以来山西道教发展连续不断。山西道教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四大特点，即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道教人物的众多性、道教场所的普遍性、道教艺术的多样性。

贾发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博士。

主题词：山西 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它与儒、佛并立于封建社会。道教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经济乃至民族性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千百年来，道教累积了大量遗存和文献资料，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道教活动和传播的主要地区，积淀着深厚的道教文化，遗存了丰富的道教名山、名观、名迹等道教文物。道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山西道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道教历史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总体来说，山西道教历史的发展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道教人物的众多性、道教场所的普遍性、道教艺术的多样性。

一、山西道教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道教发展萌芽、发展、兴盛、衰落的全过程，所以山西道教在历史发展中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一般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是由张陵在四川鹤鸣山（鹤鸣山）创立，初名天师道（五

斗米道）。张陵之孙张鲁在 30 多年里将五斗米道推行于巴、蜀、汉中等地。张鲁投降曹操后被封为万户侯，天师道得以公开传播。道教原始的思想受到老子所著《道德经》的重要影响，著名道教史专家卿希泰先生给道教的定义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某种实践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中国本民族的传统宗教。”^①

早在春秋末年，山西就有传播道家学说的学者，如解州关尹子受老子《道德经》启发撰《关尹子》九篇，阐述老子思想；老子的弟子晋文子曾作《文子》一书，后来被道教尊为“无上真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山西恒山一带就出现称为“神仙”的炼丹方士，茅盈就在恒山出家，修真布道 30 多年，后称为“太元真人”。据《清凉山志》记载，东汉时五台山就有修道者，建有紫府庙；洪洞也建有紫微观、披云观、真一观等。这些实践是东汉后期道教产生的基础。

道教创始人张陵弟子赵昉得道后回到故乡山西临晋水泉里（今山西蒲县赵昉村）修真服气，弘扬师道。其时还有王乔、黄安、昌荣、君澄和

张铁卿等,在山西河东、代州、恒山、汾州和绛州等地传播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迅速发展。西晋时上党(今山西黎城县)人鲍靓,在嵩山作著名的《三皇经》,后传于道教思想家、外丹学的奠基人葛洪。葛洪将玄学与道教、神学与方术,丹鼎与符水相结合,著《抱朴子》一书,确立了以金丹道为中心的道教神仙理论体系。东晋时,山西闻喜县郭璞著《洞林》、《祈林》等名篇,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发展。北魏太武帝时,嵩山道士寇谦之,先在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凤凰观修道,后来到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献经,在宰相崔浩的推荐下,寇谦之向太武帝进献了《录图真经》,并对太武帝宣讲新天师道的教义,深得太武帝的赞赏和推崇。史载,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②寇谦之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革,“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变原始道教为贵族道教,使其与皇权更加紧密地结合,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同时在寇谦之谋划下的多次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太武帝更加崇信道教,排斥佛教,他自称太平真君,改国号太平真君,道教几乎成为北魏的国教。山西作为北魏中心地区,到处宫观林立,以平城为中心的北天师道传遍山西各地,道教在山西得到了很大发展。

隋唐是道教蓬勃发展的隆盛时期。内因是通过魏晋南北朝长期佛道之争,道教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思想,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外因是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大力倡导。隋朝统治时期,山西成为道教徒活动的热点区域。隋炀帝多次巡幸山西,利用道士斋醮,为其统治服务^③。《太平广记》载,魏征少时曾经访道至恒山,得道教《黄庭经》。《黄庭经》是道教上清派的主要经典,受到南方茅山派的尊崇。南朝末年及隋唐之际,茅山派道士北上传道,使上清经法传入北方,深刻影响了北方道教,极大地扩展了茅山派的势力。隋末山西地区,不仅是北魏寇谦之新天师道

流传的重点区域,而且也成为由南北上的道教茅山派传播的主要区域。山西成为南北道教交流和融会的地区。

隋唐嬗代之际,山西汾晋民间流传着一些道教色彩浓厚的谶语,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不少的谶语。如《桃李谣》、“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武德九九得声名”,道士卫元嵩诗“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李树没黄杨”,民间道教谣谶为李唐代杨隋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宣传。

李渊太原起兵反隋的战争中,多次受到道士的帮助,如天神显灵、密传符命,“逸民道士”直接请战,出现了“霍山神话”^④、“羊角山神话”^⑤。反隋建唐后,高祖李渊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祠,取名庆唐观,授道士王知远散大夫并赐紫衣;唐太宗将道士排在僧侣之前;高宗李治在晋阳旧府建了昊天观。尤其是李唐王朝将老子尊为同姓始祖,神化李氏皇权。自此,全国上下崇道成风,山西各地宫观林立,建宫观庙宇几百处,如洪洞孙真人庙规模盛大,占地 300 余亩,其他如恒山庄泉观、灵丘白音观、应县冲虚观、翼城庆雷观、洪洞水神庙等一大批宫观也相继建成。唐玄宗把《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下令每户必备一本,并将茅山派第 11 代宗师司马承祯迎入宫中,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开元十七年,唐玄宗还亲自率领皇子皇孙、文武大臣、各国国王和使节在羊角山老君庙树立了一块《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碑,并亲撰碑文。其时在山西流布的道派有薛季昌和司马子微弘传的正一道,蒲州薛幽栖弘传的天师道,晋城张氤弘传的净明道,吕洞宾与韩湘子弘传的全真道。中国道教发展到顶峰,山西道教也发展到了最繁荣的时期。

五代纷争,山西道教不断受到打击。如契丹世宗天禄四年,辽军准备进攻中原,派人到恒山求卦,因卦不吉利便放火烧了恒山庙观;后周世宗勒令晋南僧侣废寺还俗时波及道教,多数道士被迫还俗,许多宫观被封。

宋元是道教史上相当活跃的发展时期。北宋

统一后,为收揽人心,维护稳定,建隆元年,宋太祖刚即位就一改周世宗废止寺观的政策,给高道赐紫衣,增加道士人数,道教得到恢复和发展。宋徽宗尚道,在其倡导下,山西各地又相继修建了大同太宁观、洪洞玉虚观、清灵观等大批宫观。宋元时期,山西主要盛行全真道、正一道和真大道。全真北五祖之一的刘海蟾从钟、吕得道后,往来于名山大川,隐居山西代州赵杲观,创立了以“省悟自归隐”为道旨的全真刘祖派,弟子张伯端为山西翼城紫阳宫的高道,主张“先命后性”,由道入禅,作内丹学经典著作《悟真篇》,元代被尊为“南五祖”之首^⑥。由于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隰州(今山西隰县)丘处机格外崇敬,封其为国师,山西道教全真派得到了全面发展,各地兴建宫观,如其弟子秦志安主持的平阳元都观和向南卿主持的芮城永乐宫,香火甚旺。同时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张真一等也曾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地传法。尤其是弟子宋德芳,除在平遥玄都观校刻《道藏》外,还在太原龙山主持重建了“昊天观”并雕凿了中国唯一的道教石窟——龙山石窟。

明代,太祖朱元璋推行了严格的宗教统一控制政策,先后设立了玄教院、道录司统一管理道教事务,山西道观中一些因逃避徭役而出家的道士被勒令还俗,自元朝以来一度泛滥的传道活动得以遏制。但明世宗的崇道,重新导致道教无限制地发展起来。至明末清初时,道观已遍布全省城乡各地,仅洪洞一个县就有150余座,柳林县共建过373座^⑦,可见明朝末期全省道教之盛。

明清之际,道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呈现出三教合流、道派归并的趋势,如恒山悬空寺由道观变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同时供奉释迦、老子、孔子三家祖师。山西流布的也只有全真道之三丰派、龙门派和武当正一派。明初,平阳张三丰为吕洞宾以来最为世所仰慕的全真派高道,主张三教合一,以道为法,儒释为用,重视修炼丹法,主张清静修炼阴阳之法,曾在太行山、王屋山间传道,受学门徒甚多。入清以后,趋向民间发展的道教对民间宗教和秘密会

社产生了很大影响。鉴于全真道在明季道风颓败,教戒松弛,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道士龙门派第7代传人王常月在主持北京白云观期间,设戒坛培养道士,修改和制定清规戒律,致力于教团改革。清末山西曲沃龙门派第11代道士刘一明是有名的内丹学家,在丹理上造诣高深,堪称一代宗师,在我国养生史上也占有显赫的地位。另外,五峰山龙泉庵的郭静中、阳曲柏树村纯阳宫的潘守器,均为清代山西著名道士。随着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及伴之而来的西洋各种宗教势力日趋强盛,山西道教趋于衰落。

综上所述,道教在山西的传播具有不间断、连续性的特点,山西道教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点是其他三个特点的基础。

二、山西道教历史人物的众多性

早在春秋末年,山西就出现传播道家学说的人物。如前述解州关尹子著述《关尹子》九篇、晋文子曾作《文子》,阐发老子的黄老思想。西汉时,茅盈就出家恒山,志求神仙,三十年后升仙,列“太元真人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之位。东汉时张陵在蜀地创始五斗米道后,弟子赵昉就回到故乡山西临晋水泉里修真服气,弘扬道教,以如前述。当时还有王乔、黄安、昌荣、君澄和张铁卿等道士,在山西河东、代州、恒山、汾州和绛州等地传播道教。这些道士是在山西最早传播道教的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在山西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中国道教史上重要的人物。两晋上党人鲍靓在嵩山编撰了《三皇经》,阐发道教思想。后来传给其女婿葛洪,葛洪将玄学与道教、神学与方术、丹鼎与符水相结合,著《抱朴子》一书,确立了以金丹道为中心的道教神仙理论体系,为道教的完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山西闻喜县高道郭璞著《洞林》、《祈林》等名篇,又注释《尔雅》、《楚辞》,《山海经》等书,极大地推动了道教文学的发展,被后世尊为神仙。北魏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作为道教改革家,先在山西代州凤凰观修道,后来在北魏国都

平城献经、得到魏太武帝的器重和支持,完成了天师道改革,使其与皇权结合,称为北天师道,道教因之几成北魏国教。此后,山西各地出现不少弘传北天师道的道人,如河东祁纤,好相人,曾被太武帝拜为上大夫;闻喜吴劭,道引养气,积年百余岁,神气不衰;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太武帝曾令他还乡里,诏河东郡给所需。这些道教徒活动,把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迅速传播到山西各地。

隋唐是道教蓬勃发展的隆盛时期。杨坚建立隋朝时,曾得到山西道教徒的支持。如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三人,因在高祖杨坚称帝前大力帮忙,称帝后分别被任命为华州刺史、开府、上仪同等职^⑧。山西道教徒还为杨隋政权制造符谶以巩固其统治,如太原童谣有“法律存,道德在,白衣天子出东海”^⑨,于是杨坚着白衣到东海,并画五级木坛自随以事道。在杨隋政权扶持下,山西道教大兴土木,建祠立观,山西闻喜祁观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史载“月殿日宫,高排星汉”^⑩。隋炀帝杨广崇道更甚其父。《隋书》卷35《经籍志》记载:“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河东汾阴人马贲,“少好玄言,去俗为道士,解天文律令,隋炀帝时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⑪隋时出家为道的魏征,云游山西恒山时,把南方道教茅山上清派经典《黄庭经》传播至北方,促进了南北道教的交流的融会。

李唐王朝将老子李耳尊为同姓始祖,自居老子后裔,神化李氏皇族,把道教奉为国教,全国传布,唐朝历代皇帝都视道教为护持李唐统治的本族宗教。高祖在羊角山修了老君祠,道士王知远被李渊授朝散大夫,并赐缕金冠和紫衣,成为接受皇帝赐紫衣的第一人。太宗时王知远又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高宗在晋阳旧府建了昊天观。玄宗时山西崇道最甚。其时在山西流布的道派有薛季昌和司马子微弘传的正一道,蒲州薛幽栖弘传的天师道,晋城张氤弘传的净明道,吕洞宾与弟子韩湘子弘传的全真道。道教所敬诸神中

影响最大的是八仙中吕洞宾,号纯阳子,就是蒲坂(今山西永济市)永乐招贤里人,在庐山从钟离权得道后,云游四方,行善积德,深受民众敬仰,影响遍及中外,是全真北宗五祖之一。吕洞宾弟子、韩愈侄孙韩湘子,也曾任沁州(今山西沁县)塔地村长春观修炼成仙。张果老往来于汾晋五台山,后于恒山修炼成仙,其《道体论》著作是道教讲练功之法的重要典籍。可见道教八仙中一半人物都与山西有直接关系。

介休绵山是宋代道教活动的地区之一。据《汾州通志》载,宋神宗敕封绵山介子推为洁惠侯,由宰相文彦博奉旨绵山举行了盛大的敕封大典。文彦博本人也崇尚道教,“自号南极真人”^⑫。庆历八年,文彦博贝州平叛后,为感九天玄女助战之恩,于故里建玄神楼。文彦博屡上绵山,研究道教养生,其长寿秘诀为“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全真北五祖之一的刘海蟾从钟、吕得道后,往来于名山大川,隐居于山西代州赵杲观,创立了以“省悟自归隐”为道旨的全真刘祖派,其徒张伯端为山西翼城此阳宫的高道,主张“先命后性”,由道入禅,作内丹学经典著作《悟真篇》,元代被尊为“南五祖”之首。在山西盛行的全真道还有龙门派,其启派祖师就是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隰州(今山西隰县)丘处机。丘处机由于得到成吉思汗的崇敬和信任,被封为国师。丘处机以“济世真行”为宗旨,对全真道在山西发展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其十八高徒均被封为道教“真人”,其中在山西传道的有宋德芳、向南卿、秦志安、尹志平、张真一。宋德芳除在平遥玄都观校刻《道藏》外,还在太原龙山主持重建了道观“吴人观”并创建了龙山道教石窟。秦志安在平阳元都观弘传道法,向南卿对芮城永乐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使其成为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

明初,平阳的张三丰为吕洞宾之后最为世所仰慕的全真高道,提倡“三教合一”的主旨,以道为法,儒释为用,重视修炼丹法,主张清静立基,再修阴阳之法,曾在太行、王屋间传道,受

学门徒众多，因不修边幅而谓之邈邈派道人，同时也是武当山拳术、剑术的创造者。入清以后，道教对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产生了很大影响，山西流布的道派除在北武当山盛行武当山派之外，主要是全真道之龙门派。全真道于明季道风颓败，教戒松弛，潞安府龙门派第7代高道王常月主持北京白云观，以振兴教门、恢复全真祖风为己任，采取清整戒律、整顿全真道的措施，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誉为全真“中兴之祖”，羽化后被康熙追赠“抱一高士”之号^⑩。清末，龙门派第11代道士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刘一明为有清一代颇具名气的内丹学大家。他勤学苦练，在丹理上造诣高深，实践上功夫深厚，使其性功命功同致上乘境地，堪称一代宗师，在我国养生史上也占有显赫的地位。另外，五峰山龙泉庵的郭静中、阳曲柏树村纯阳宫的潘守器，均为清代著名道士。

综之，山西历代道教人物众多，山西道教人物为山西道教的发展做出了成绩，为中国道教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山西道教场所的普遍性

道教历来崇尚自然，崇拜名山大川；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成仙，因此，道家往往隐居于山岳之间，山西多山的自然环境成为道人修炼、传道时选择的偏爱。在道教兴盛的各个历史时期，山西各地建有诸多道教宫观院庙。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就有1952处^⑪。限于篇幅，挑选各地有代表性的道教场所略述。

以北岳恒山、五台山为中心有山西北部庞大的道教古建筑群，恒山与泰山、华山、衡山、嵩山并称五岳，齐名天下。历代帝王十分重视对恒山的祭祀，唐宗、宋祖等都曾到过恒山巡视、祭奠，或差使臣到恒山朝圣。道教称恒山为“第五洞天”。据道教典籍记载，远在春秋时，太上老君就在恒山千佛岭结庐炼丹、燃灯道人演兵斗法；汉武帝五岳封禅时，便开始在恒山建立庙观；传说西汉时昌容仙子来往于恒山，三茅真君

（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在恒山修炼神仙之术。北魏平城时代，恒山主峰属京畿之域，备受北魏帝王青睐。太延元年，太武帝下令在恒山飞石窟内建北岳庙。寇谦之在恒山宣扬新天师道，翠屏峰上又修建了悬空寺，恒山道教兴盛起来。隋唐时期，八仙中的张果老、吕洞宾在恒山修行服气，管革于此结庐悟道，使北岳道场名扬九州。明代恒山道教主流是全真教龙门派，也有正一教和太乙派，丹道、符篆、性命双修一应俱全，明代恒山庙观大规模扩建、新建，有“三寺四祠七亭阁，七宫八洞十五庙”之说。明清时期悬空寺，纳十方之神灵，汇三教之众神，供儒、佛、道三家始祖于一殿，堪称中国宗教史上的佳话。

五台山是驰名中外的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五台山早期为道家所据。五台山别名紫府山，是道教神仙的居处，是道教对五台山的尊称。道教崇尚紫色，如紫衣、紫室、紫洞、紫皇、紫宫、紫清等称谓。在五台山最早活动的宗教是道教，留有丰富的道教文化遗存，演绎出许多道教神话传说。佛教传入五台山后，佛、道两教为了各自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佛教获得了胜利，统治了五台山。对道教予五台山的美称“紫府”，佛教采取了保留与改造的办法，使之披上了佛教的色彩。紫府也就成了佛、道共认的五台山之别名^⑫。

山西西部吕梁山脉中段的北武当山也是道教名山。道教认为北武当山是真武大帝北方行宫，是全真道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早在隋唐时北武当山已建有庙观，是华北、西北地区很有影响的道教圣地。部分庙观在明代得以重修，现存真武庙、龙王庙，山顶有玄天殿、太和宫等古建筑耸立。据清乾隆^⑬年《重修神山复古记碑》记载：北武当山创建于唐时，山上建木殿一间。东茶房一处，殿内塑玄天上帝十大元帅。铺路石磴千余，柱狮栏杆俱全。而据清同治4年《帝德常昭碑》所载，在唐代以前北武当山已是道教的北方朝拜圣地，山顶建造有玄天大殿，每年三月三日圣诞，绅庶老幼，昼夜徒步拜谒，朝山进香者，

数百里不绝,可见香火之盛。唐宋之后,随着岁月流逝风雨腐蚀,或火灾或人为破坏,殿宇、塑像常有坍塌损坏,但历朝历代也屡有修复和扩建。据现有碑记,明永乐 11 年成祖朱棣侄庆面王济炫、永和王济朗兄弟俩权住汾州府时,因崇拜真武大帝,付巨资将登山之崎岖小路改造成石砌台阶,并将早已坍塌的玄天大殿修复一新。后又补修三次。据明万历 27 年所立《龙王山重建玄天上帝宫纪》碑文“龙王山上有玄帝庙一楹,……乡民攀应秋等,洗心誓众竭诚修理焉,山巅重建正殿三楹,中塑玄帝圣像”,清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和增补^⑥。近年来学者考证,“北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发源地”^⑦,是对北武当山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山西中部的道教场所有介休绵山和太原龙山。介休的绵山从春秋时代起就有道家及道教的频繁活动,许多道家人物慕名而来,仅龙脊岭就留下了陈祖、彭祖、吕祖等十余座修行洞;水涛沟成为历代高道辟关辟谷的首选之地,先后有张良、雷隐翁、王贾等著名道教人物在水帘洞内辟关、辟谷修行养性。《列仙传》把介子推视为道教神仙。两汉时期,道家人物在绵山一带的活动十分活跃。张良“西入关道,出绵上”,为绵山脚下的百姓治绝狐患。介休三贤之一的郭泰称羨道家,希望“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⑧,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正郭篇》中把他视为道家人物。李世民在雀鼠谷大战后为答谢道教神恩,敕建天桥洞神宫;唐高宗李治于永徽 2 年敕建一斗泉洞真宫;唐玄宗南出雀鼠谷后敕建大罗宫。绵山李姑岩庙亦为唐代所建。宋代绵山最大的道教活动是宋神宗敕封介子推为洁惠侯,文彦博奉旨在绵山举行了敕封大典,现有封侯亭遗存。文彦博庆历 8 年贝州平叛后,为感谢九天玄女助战之恩,于故里建玄神楼。文彦博本人也崇尚道教,“自号南极真子”。后文彦博屡上绵山,研究道教养生。金代国史院编修介休人马天来,曾数次游历绵山,塑造道教神像。元代介休道人梁志通往返于陕西玉泉观和绵山之间,对绵山道教发展的影响很大。明清时期,传说明

太祖朱元璋之父朱五四曾到绵山朱家凹修行道教,朱元璋子朱橚、朱权及第六代晋王朱知烺等,都相继朝拜绵山,修建寺观。与道教有关的民间祈雨文化在绵山也长盛不衰,唐太宗、金大定、明洪武年间均有百姓祈雨的记载,甚至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曾国荃也在绵山主持过大型的祈雨活动。道教的传播,使绵山产生了独特的道教文化习俗,如大罗宫求运挂云牌、抱腹岩祈雨还愿挂铃、天桥求子挂灯等,久盛不衰,沿袭至今。

太原龙山是著名的道教场所。元初道士宋德芳,在太都、河东、终南山之间活动。据《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载:宋德方于元太宗六年“游太原西山,得昊天观故址”,在太原龙山主持重建了“昊天观”,并开凿了石窟。据《嘉靖太原县志》记载,在龙山绝顶“昊天观东石崖列凿石室八龛,有道者姓宋号披石子所凿”。龙山现有石窟 8 个,多为元代作品。内有石雕造像 40 余尊,主要刻画了道教祖师、神仙的各种形象,具有浓厚的元代风格,是道教雕刻艺术的经典作品,其造像内容、雕刻技法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晋中一带平遥清虚观、汾阳太符观、柳林玉虚宫、介休后土庙等都是著名的道教建筑遗存。

山西西南部的道教场所有芮城的永乐宫和河道的道观。位于山西最南部的芮城县的著名道观永乐宫,是龙门派创始者丘处机及其弟子修造的。相传是为尊奉八仙中的吕洞宾而建造的。吕洞宾是八仙中影响最大、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最多的仙人。唐代时就将他的故居改建为吕公祠,金朝末年改祠为观。元代重建扩建后,改称大纯阳万寿宫,因地处永乐镇,故又称为永乐宫,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宫内有三清殿、重阳殿等四座规模宏大的元代殿宇,整个修建工程和壁画的绘制,前后费时约 100 余年。永乐宫最珍贵的是三清殿的元代《朝元图》壁画和纯阳殿的《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精品巨制。明万历和清乾隆、嘉庆年间先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扩建,形成道教“天宫琼宇”建筑

特色的木结构建筑体系。除了永乐宫外，河东地区的道教场所还有绛县东华山道观群，包括东岳庙、崇祯观、昊天洞、景云宫、三清殿、文昌阁、老君庙、老君桥等建筑；另外还有蒲县东岳庙、新绛稷益庙等。

山西东南部的道教场所，有晋城的玉皇庙和珥山。创建于北宋年间著名道教庙宇玉皇庙古建筑群，是古代泽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道教庙宇。三进院落，殿阁楼亭 110 多间，规模宏伟，布局合理。最珍贵的是元代艺术大师刘銮塑造的二十八宿元代彩塑，我国雕塑艺术中的奇葩，属全国已发现的古代塑像中的孤品。晋城珥山也是古代道教圣地，包括魁星楼、黑虎殿、献台等建筑，其中，真武观供奉真武帝君，道教认为，武当山是真武帝君修炼之地，而珥山则是其镇守之所。早在东汉时期，珥山就被辟为道场。北宋时期，道教辉弘，真宗皇帝为了稳固江山，认神为主，将玄武改为真武。自宋至今千余年来，珥山真武观香火旺盛，道士云集，是晋东南地区及豫西北地区信徒朝拜的圣地。另外，长治玉皇观也是晋东南地区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

综上所述，道教场所在山西北部、西部、中部、西南部、东南部均有典型的分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四、山西道教艺术的多样性

1. 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

山西道教活动及传播历史悠久，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遗存，其中道教建筑、绘画、雕塑、石刻等尤其独特。

山西芮城永乐宫元代建筑和壁画，是道教建筑和绘画艺术的典型。这个规模庞大的建筑历时 100 多年才完工。宫殿巍峨壮丽，雕梁画栋，是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之一。永乐宫沿中轴线布置了宫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进院落，其中木结构楼阁成为道教建筑的特点之一，院落建筑按道教“天宫琼宇”的艺术构思设计，形式奇巧、独特的道教艺术风格。

永乐宫艺术价值除了建筑的独特外，还有宫殿中大规模精美的元代壁画，总面积达 960 平方米，壁画场面雄浑、题材丰富、技艺高超，是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精品巨制。主殿三清殿《朝元图》完成于公元 1325 年，壁画长 101.6 米、高 4.26 米，面积 403.34 平方米，由 286 个群仙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围绕天帝、天母等 8 位主神，二十八宿、十二宫辰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徐徐展开，人物高达 2 米以上，构思严谨，墨线流畅飘逸，场面开阔，色彩艳丽，气韵生动，集中地表现了道教神仙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礼仪。众多的人物，高低错落，神态各异，衣袂轻扬，构图极富变化，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又有统一完整的艺术效果。在用色上采用了传统的重彩勾填方法，以墨线为骨干，再填以金、朱红、青绿等色，配搭得很和谐，有些部分还用了“沥粉贴金法”，增强了质感的对比，令画像的立体感和辉煌的气氛更加显现，被专家们称为是现存壁画中最精彩的艺术品。

纯阳殿为奉祀吕洞宾而建，殿内东、西、北三面墙壁上绘有《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壁画，高 3.5 米，面积为 203 平方米，以连环画形式表现了吕洞宾从诞生到得道成仙的故事，由 52 幅画组成，幅与幅间用山石云树连接，每一画面既单独成章，而又能通过景色相互衔接。画中有宫廷、殿宇、庐舍、茶肆、酒楼、村塾、医馆、舟车、田野、山川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不少的画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这在道教壁画上是具有创造性的构想。后壁上绘有《钟吕谈道图》。重阳殿壁画用 49 幅画面描绘了道教全真派教主王重阳从降生到度化七真弟子成道的故事。这些壁画情景交融、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也堪称元代绘画的精品，从其反映道教和民众社会生活的方面来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太原龙山石窟，是我国唯一以道教内容为题材的石窟，石窟的主要部分为元代全真教道士披石真人宋德方主持营建。据《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当时在龙山上建有昊天观，在崖东凿

石窟八龕，龕內造像，數額不等，共計 60 余尊。龍山道教石窟着重描寫了道教祖師、道教神仙的形象。這些雕像有坐、有卧、有動、有靜，個別石窟內的石雕塑像表情含蓄，耐人尋味，有着誘人的藝術魅力，造像平易近人，和藹可敬，具有濃郁的漢民族風格。這些石雕，風格樸實、莊重，手法凝練，衣帶雕飾簡潔、素靜。三層窟洞層疊及在窟頂部大量應用龍鳳石紋和蓮花圖案雕飾，與佛教石窟的雕塑藝術風格截然不同。石窟兩側及前壁還保留着許多元代道家的題詞和鏤書，為研究道教石窟藝術和道教發展史提供了重要資料。龍山石窟的規模和氣派雖不能與佛教的大同石岡石窟相比，然而它以自己的渾厚樸實、莊重無華的道教藝術風格，將載入中華民族的藝術史冊，在中國石窟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⑩。

晉城玉皇廟是晉東南著名道教廟宇。玉皇廟三進院落，殿閣樓亭 110 多間，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山門單檐，用琉璃裝飾，與鐘鼓樓頂上琉璃孔雀蘭構件相互增輝，十分鮮艷。諸殿木構樓閣、板門直棖窗，雕刻精細，古雅樸實。建築布局合理，富麗堂皇，環境幽然。最有藝術價值的是廟內 300 多尊道教諸神泥質彩塑，其中又以西配殿二十八宿元代彩塑為最，屬全國已發現的古代塑像中的孤品。二十八宿彩塑，內容奇特豐富，布局嚴謹合理，情態生動逼真。第一次將天文學中觀察天體運行、四季變化、經緯定位的 28 組赤道星座與唐代五行家袁天罡確定的 28 種動物同金、木、水、火、土、日、月合於人，創造出有血有肉的形象“虛日鼠”、“元金龍”等行星人蟲神話人物，成為我國雕塑藝術中的奇葩。山西道教繪畫燦爛奪目，除上述壁畫外，還有汾陽太符觀、新絳稷益廟等處的壁畫也比較著名，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2. 山西道教音樂

道教音樂是表達宗教信仰、宣傳教理、教義的重要手段，包括“道教科儀音樂以及道士在宣教、布道和修身養性時所使用的音樂”^⑪，千百年來已與宮廷音樂、文人音樂、民間音樂漸相融

合，“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體”^⑫。山西道教音樂主要有兩大派，即晉北正一道派和晉南全真道龍門派。正一道派道士平時在家，應請出外做法場。全真龍門派道士多為長住道觀的“出家”道士，以誦經、修真為主要活動。山西道教音樂依用途可分為兩種：一種為“紅事”，祭祀皇天后土、祈求五谷豐登，表演曲目有“普庵咒”、“要賬”、“水紅花”、“大走馬”、“駐馬亭”、“罵漁郎”等六大套曲，每套曲均為帶有經義的唱和奏。另一種為“白事”，主要是驅惡避邪、超度亡靈，表演曲目有“一盞燈”、“十滅罪”、“瑜珈經”、“種種無名”、“一炷道德香”、“五音贊”等。山西道教音樂按音樂形式分為聲樂和器樂兩類。聲樂（韻腔）曲目有《老君經》、《十報恩》、《開經曲》、《上香曲》、等。器樂分打擊樂和管樂。打擊樂器有單手鼓、鐃、小鑼、木魚、手鈴等，曲目有《打鬧台》、《三通鼓》、《三啟頌》、《步虛》、《小河溪》等；管樂器有管子、笙和笛，表演時通常與小鼓、大鼓、小鈸、大鈸、云鑼等打擊樂器合奏。曲目有《耍孩兒》、《翠黃花》、《青天歌》和套曲《駐馬亭》、《走馬》、《水紅花》、《罵漁郎》、《要賬》等。

山西道教音樂中的器樂演奏，晉北、晉南各有特點。晉北道樂的慢板和中板段，主要用管子吹奏，有時也換用低音大管，造成音色對比，在樂曲進入高潮時，管子與大管輪番對奏，使氣氛高雅而熱烈。晉南道樂很注重演奏技巧及相互配合，其要領歸結為：“噴吶領，管子應，加花笛子彌縫笙。隔板鼓，直板鈸，有板有眼把云鑼打。”

晉北道樂以北岳恒山道樂為基礎，吸收了漢魏以來的鼓吹樂、唐宋以來的佛教法曲及少數民族音樂而形成的古老的音樂藝術，流傳於山西北部的大同、陽高、渾源、應縣一帶，並遠及河北、內蒙古周邊省市，已自成流派、自立體系，其古老的樂曲，完整的曲目，對弘揚傳統文化，繼承和發展民族傳統音樂，有着深遠的影響。2006 年“恒山道樂”被公布為“山西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晋南道乐流派较多,其中绛县东华山道乐最为典型。东华山道乐北魏时期就十分盛兴,道教班社众多,演奏道士云集,至今还保留着原始形式的祭祀活动。随着道教音乐的发展,逐渐吸收本地民间音乐的成分,道教班社级别也不断升级,曾被定为“道会司”级别,形成了晋、豫、陕三省道教音乐活动的中心。绛县道乐特色是旋律流畅、曲调高亢、节奏明快、旋律变化无常,特别是“将唱腔、鼓乐、吹奏、表演技巧组合一起,恰如其分表现出道教音乐清静无为、仙界缥缈的意境”^②,同时集中地保留了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五声调式。建国后,绛县道乐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组建了绛县东华山道教乐团,主要从事道教法事、开业奠基、社火表演、祈福求安等大型庆典活动。绛县东华山道教乐团曾应邀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神庙“祭祀”和民间庆典活动,现已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山西道教音乐广采博纳,不仅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而且还吸收了佛乐等有关音乐成分。同时,山西道教音乐也对当地民间说唱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山西道情就是由道教音乐衍化而成的一种在山西广为流传的说唱艺术,比如恒山道情、河东道情,反映了道化升仙、修贤劝善、民间生活、历史故事等内容,山西道教音乐还推动了山西锣鼓、杂戏等古朴戏曲形式的发展。

3. 山西道教艺术品

山西作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再加上山西长年比较干燥的气候环境,因此,山西遗留了比较丰富的道教文物艺术珍品。

山西道教造像质地主要有铜、木、石、陶瓷等,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山西道教艺术品可谓种类繁多、精品不绝。道教人物是道教造像的主体,现存主要以元明清三代居多。如一组19件的元代木雕人物,造型生动,色泽艳丽,刀工娴熟,是元代道教木雕艺术佳作;明代铜铸真武坐像,着袍衬铠,披发跣足,手持宝剑,威而不怒,形神兼备,引人注目;明代铜铸文昌彩绘坐像,白脸长须,戴五梁冠,宽袍广袖,双手持

圭,坐双层四足方床,表情庄重、慈祥;明代周公立像和桃花女立像,五官端正,比例适度,姿态优美,衣纹流畅,可谓道教造像中的佳品;明代木雕真武坐像、吕洞宾像、元始天尊像,除造型结构准确、衣纹线条得体外,其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比较成功,把这些仙者既慈祥又威严、既持重又潇洒的气度和盘托出,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回味;明代石雕八仙过海人物,体呈山形,用镂雕、深浅浮雕和阴线刻纹等多种手法,琢成八仙过海情景。图中山高松青、波涛汹涌、八仙情态不一,各显其通,把道教人物和故事表现得活灵活现,大有如临其境之感;清代八件红木雕嵌银丝八仙人物,神态各异、表情丰富,衣褶流畅、制作精细,是不可多得的木雕工艺品。

另一类是道教器物。1958年山西大同宋家庄冯道真墓出土的元代月白釉炉,饱满的造型,厚实的胎体,浓重的蓝釉,是元代钧窑所出的佳品;明代铜铸道人仙鹤酒注,把艺术性和科学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在那颇有几分仙气的道人脑后置一注酒孔,手击圆盘,酒便从腿前仙鹤嘴里流出,既巧妙又有趣,充分体现了古代匠师的聪明和智慧,也说明了道教化整为零、无孔不入,与整个社会文化和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清代瓷器青花老子出关图棒槌瓶,造型简洁大方,制作规整精细。通体施白釉上绘青花纹饰,腹部绘老子出关图,人物形象独特,神态自然生动,颇有道家意境和生活气息;清道光青花八仙人物胆瓶,盘口长颈,溜肩圈足。通体施白釉,上绘六层青花纹饰,布局饱满紧凑,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刻画逼真;另几幅馆藏作品如八仙庆寿插屏、麻姑献寿像等,都是清代道教文物中的石雕作品。

另外,山西朔州崇福寺文管所藏的一组九件明代成化年间的八仙庆寿法花塑。这是明代山西南部兴起的一种釉陶新品种,向有“山西素三彩”之说。它均为陶胎,采用模塑工艺整修而成,施孔雀绿、紫、黄三种色釉。人物造型准确,形神兼备,色调古朴,素淡典雅,堪称明代法花塑中之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③。

2003年春,山西道教文物首次在香港展出,展品包括书画、陶瓷、漆器、石雕、木刻、翡翠及青铜雕塑逾60件。这些珍贵的山西道教艺术品有一些还未尝在国内展出过。山西芮城县出土的唐代《杜君秀道教造像碑》,既展现了唐代道教发展的情况,又保存了唐代书法的真迹。数幅保存完好的清代工笔画,如《钱慧安和合二仙图轴》,色彩鲜艳,神仙造型与线条皆登峰造极。展品中有多件木雕,如明代的木雕“真武坐像”雕工精妙,至今完好;还有木雕吕洞宾像、八仙人物、元始天尊像等。另有青铜雕、石雕,如明代铜雕桃花女立像;陶瓷有清代道光年之“青花八卦纹盅”茶具等,而五老观太极图笔筒为竹雕品,至于形态各异的铜镜为数更多,如永乐宫文管所藏高达198厘米的清代铁梨木雕“犀牛望月镜”,是铜镜中的精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③。

总之,山西道教艺术可以从道教的建筑、绘画、音乐、艺术品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而多种艺术形式,反映了山西道教艺术的多样性特点。

五、结 语

山西道教经过北魏寇谦之改革之后得到迅猛的发展。隋唐王朝对山西道教大力扶持,使山西道教渐呈兴盛之势。宋元明清以来一直延续不断。在山西道教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道教人物,这些人物对山西道教乃至中国道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山西道教以名山大川为修行和传教场所,修建了许多巧夺天工的道教宫观,留下了诸多道教名胜古迹。山西道教艺术多样性,表现在造像、绘画、音乐、雕刻等各个方面。山西道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民众的世俗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道教文化对山西社会的哲学、医学、化学、体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多元文化之融合,在山

西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無邑)

- ①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 ②《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2—3053页。
- ③《隋书·礼仪志》载:“大业中,炀帝因幸晋阳,遂祭恒岳。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坛中设醮。”
- ④《旧唐书·高祖本纪》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页。
- ⑤《唐会要·尊崇道教》卷50,范祖禹《唐鉴》卷1。
- ⑥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 ⑦刘强:《道教在山西》,《文史月刊》,2003年第10期。
- ⑧《隋书·来和传》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74页。
- ⑨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 ⑩《山右石刻丛编》卷4《祁观天尊碑》。
- ⑪《册府元龟·总录部·尚黄老》卷822。
- ⑫《嘉庆介休县志》。
- ⑬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1页。
- ⑭许高哲、田爱民:《山西道教文化遗存管窥》,《文物世界》,2003年第6期。
- ⑮王君:《山西道教名胜古迹拾零》,《文物世界》,2007年第4期。
- ⑯魏兴元、李福庆:《道教圣地北武当山》,《文史月刊》,2005年第11期。
- ⑰白礼昌、白埃平:《古史新考》,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57页。
- ⑱袁宏:《后汉纪》卷23《孝灵皇帝纪》。
- ⑲王君:《山西道教名胜古迹拾零》,《文物世界》,2007年第4期。
- ⑳熊铁基、刘国盛:《道教文化十二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第123页。
- ㉑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9页。
- ㉒杨永兵:《晋南传统音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 ㉓主要参考许高哲、田爱民:《山西道教文化遗存管窥》,《文物世界》,2003年第6期。
- ㉔《香港大公报》,2003年3月27日。